

曹海东

Cao Haidong



我的家乡在陕西榆林，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城——现在它更出名的别称是“塞上江南”“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

数字可以说明这一切。毛乌素沙漠，这个在蒙语中意为“难生草木的土地”的沙漠可能要从陕西版图上消失了：榆林沙化土地的治理率已达到93.24%。

要知道在我的记忆中，治沙是从小就听到的一个词汇。不曾想到，那个曾经一张嘴就一口沙的地方，能变身为沙漠绿洲。

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我对绿色、水草、湖泊这些东西，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种情感也影响到了后来对职业的选择。

前几天和一位好友聊起职业经历之时，几个场景一直印象深刻：

一个场景是大学课堂上赏析的两部纪录片。一部是讲述可可西里保护的《平衡》。再看到可可西里，已是2011年枪杀索南达杰的盗猎者自首，《南方周末》第一时间做了跟进。最近一次听到可可西里是在2019年《南方周末》的一次会议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老师指着一张图片说，为了给藏羚羊让路，青藏公路进行临时管制。另一部纪录片是雅克·贝汉的《迁徙的鸟》。这也让我形成了一个保持多年的习惯：收集环境类纪录片。

另一个场景是怒江水电开发之时，我第一次去怒江采访。当时正值雨季，我和摄影记者在泥石流间穿行怒江峡谷，这也是我实地感触在崇山峻岭之间，人类如何试图用大坝征服自然。几年后的2009年秋，《科学新闻》杂志做一期封面报道时，一位记者专门找我让我谈谈水电开发和环保的关系。记得我当时大致讲的意思是，对于大型工程来说，必须公开更多细节，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行更加有序的流域规划，才能更好地开发江河。

还有一个场景是在经济黄金期时，我几次穿行中国能源走廊。至今，我还记得2005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和老朋友、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被延绵不断的煤车

堵在晋陕交界处动弹不得，当时在卫星图片上，晋陕蒙交界之处被黑压压的云团笼罩。十年后，我再次和新华社一位好友一路西行，试图寻找经济动能和环境承载关系之时，又遇到了堵车，只是这次堵塞道路的换成了拉着巨型风机叶片的车辆。也只有此时，你能体会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

最后一个场景是2009年，我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一次活动时的触动。前几日，《南方周末》举行一个关于“慢出行”的活动，我还特意讲过这个细节。当时拜访丹麦首相顾问结束后，年轻帅气的首相顾问竟然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这些社会肌理层面的渗透，也让我意识到主流话语正在发生变化，也正是在这年，《南方周末》率先在市场化机构媒体中创办了“绿色新闻”版块。

从单纯的环境（水、土壤、大气等）报道，到环保产业追踪，再到能源产业（传统能源、新能源）的观察，再到绿色金融的跟进，以及环境与健康产业关联的拓展……过去的十几年，《南方周末》“绿色新闻”版块一直在探索环境新闻的边界，一直对环境充满热忱。我想这也是对中国环境改变的另一种贡献。

环境变化的背后是几代环保人的负重前行。回望这些变化，更能理解原国家环保总局一位领导曾给我讲述的一个关于环保公章变化背后的艰辛历程：最早环保局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一个司局，公章没有国徽图案，成立国家环保局后，公章没变大，但有了国徽，随后几次机构变化，每次变大几毫米。

非常庆幸，职业能让我用脚去丈量一个个绿色巨变。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作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我和其他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一起领读《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其中第九条是：“参与环境监督。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积极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劝阻、制止或曝光、举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浪费粮食的行为。”我想，在“双碳”目标下，这同样是对环境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整理/曹海东

作者介绍：《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